

January 1934

## 最近來的南北文化觀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最近來的南北文化觀。《嶺南學報》，3(3)，44-58。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5](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5)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第三章

## 最近來的南北文化觀

繼梁任公而研究中國南北學術的不同者，有劉光漢氏。劉氏的南北學派不同論，發表於乙巳（一九〇五）年的國粹學報第一年。他這篇文章長約二萬言，嚴格來說，對於這個問題的專題研究，劉氏恐怕還是最先的人。我們在第一章裡所敘述的各代學者南北文化各方面的對比，甚至梁任公的著作裡，也找不出一篇專門為研究這個問題的文章。不過事實上劉氏這篇文章，所討論的內容，並不跳出梁氏所劃的圈子。其實他所研究的，不過是梁氏所已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梁氏的關於這個問題重要著作，都在一九〇二年的新民叢報發表過。新民叢報之在當時，每出一冊，國內翻印者至十餘次，劉氏於三年之後，刊其著作，則劉氏之曾受梁氏的影響，也是一件很可能的事。

劉氏以為學術之所以分為南北，是由於地理的作用。從歷史上看去，「三代之時，學術興於北方，而大江以南無學，魏晉以後，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至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後。」這種見解，本來是歷代留意於南北文化的問題的共同意見，惟劉氏以為歷史上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這種的南北不同者，其故有二。他說：

「蓋青雍豫古稱中原，文化聲名，洋溢蠻貊，而江淮以南，則為苗蠻之窟宅。及五胡構亂，元(?)魏憑陵，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為左衽，積時既久，民習於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又古代之時，北方之地，水利普興，殷富之區，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啓，文學易輸。後世以降，北方水道淤為

民田，而荆吳楚蜀之間，得長江之灌輸，人民蔚起，迄於南海不衰，其故二也。」(南北學派不同總論)

他的結論是：

「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北遜於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於北。蓋北方之地，乃學術發源之區也」。

他又分門別類，和詳細的說明出南北的諸子，南北的經學，南北的理學，南北的考證學，以及南北的文學的不同。然而這些的各異，大體上和梁啟超所已解釋者，沒有分別，故沒有再述的必要。

十餘年以來，而特別是近兩年來，國人之對於南北文化的研究的興趣頗為濃厚。關於這種的文章之發表，言論之公佈者，不下二十起。但是這些的研究，每每是把文化的某一方面來做立腳點，像學術人物的地理的分佈，歷史經濟政治軍事智識等。關於學術方面的研究，上面所說的劉氏的南北學派總論，可以代表。為了便利讀者的認識，我們且將各方面的研究所得，略為介紹，並稍為批評。

從人物之地理的分佈上研究南北文化者，有梁任公丁文江張耀翔和朱君毅等。關於梁先生的研究，我們在前章已經說過。丁氏的漢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佈，是民國十二年發表於科學雜誌第八卷第一期。他從二十四史列傳裡選出籍貫可考者，五七八三人，按代按省，分配而為表，加以說明。而其結論是：人物最多的省，在前漢首推山東，後漢首推河南，唐代首推陝西，北宋又首推河南，南宋為浙江，明代又為浙江。因此可知南宋以前，中國人物集中黃河流域，南宋以後，逐漸趨於長江流域。又在唐代的廣西雲南，北宋南宋的貴州雲南，均無人物。但到明時粵桂黔滇，人物逐漸的增加。

這種人才的繁盛，由北方而趨到南方，本來是過去一般學者所公認的，這一點在前面兩章裡，已說過好多次。丁氏所研究的結果，不

過是將這些見解，加以統計的地理的證明罷。張氏在心理雜誌四卷一號發表其清代進士之地理的分佈，其材料是從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抄出。進士題名分爲二類，一爲進士出身，一爲進士及第。後者專指狀元，榜眼，探花。他以爲進士出身各省因有固定名額，不能表現自由競比的精神，故專就進士及第之三四二人來做研究的對象。據他研究所得，清代這種人物最多者，要推江蘇，次爲浙江，再次爲江西，又次爲安徽；江浙兩省的進士及第，佔全數百分之五八·九，而雲南甘肅遼甯三省連一個也沒有。我們若照歷史上的傳統的南北分界，而以江蘇浙江爲南方，那麼張氏的研究的結果，是指明南方的進士及第的人物，盛過北方。除了這一點以外，他的研究之於南北文化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朱氏所研究的時代，是清朝和民國以來的人物，（參看朱著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佈）在時代上，他的研究的範圍，雖比丁氏爲狹，然在內容的分析上，却比丁氏較爲詳細。關於清代的人物之地理的分佈的研究的重要材料，他所根據者，一爲湖南李桓所編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一爲中華書局所出版之清史傳。他將前書分爲十九類，（參看該書表四）這就是宰輔，卿貳，詞臣，諫臣，郎署，彊臣，監司，守令，僚佐，將帥，材武，忠義，孝友，儒行，經學，文藝，卓行，隱逸，方技；後書分爲七類，（表五）這就是大臣，忠義，儒林，文苑，循吏，貳臣，逆臣。這兩本書的人物都按類列表，以找出每類中以某省爲最多，同時又將各書中的人物，在各省分所佔的總數之多少爲標準。這個結論，若根據李氏書則江蘇第一，湖南第二，浙江第三，根據中華本則江蘇第一，浙江第二，安徽第三。

這兩本書的統計的結果，均以江蘇浙江的人物最盛，而與張氏所得的結論大致相同。湖南從表中看起來佔過一次第二地位。這個原

故，據他的意見，是由於編者李桓乃湖南人，對於湖南的人物，熟識較多，故爾多徵。

關於民國十五年內人物之地理的分佈，他所根據的材料，是鮑威爾 J. B. Powell 一九二五年所編的中國名人錄，和吳德海所編一九二五年的中國年鑑。這兩本書的人物，有七百五十人，若以省分計算，從民國元年至十五年，產生人物最多者，一為江蘇，次為浙江，三為河北，四為廣東，五為福建。（看該書表六）

他又將這些人物分為政治，實業，教育，軍事，四類，列為四表，其結果是政治人物，以江蘇為最多，實業廣東最多，教育江蘇最多，軍事河北最多。

最後他又將民國當代人物之地理的分佈來做統計，他以為若根據吳德海氏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年鑑的人物來看，則浙江最多，廣東次之，江蘇又次之。若根據鮑威爾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中國名人錄的人物來看，則廣東最多，浙江次之，江蘇又次之。若根據樊蔭南民國二十年所編當代中國名人錄的人物來看，江蘇最多，浙江次之，廣東又次之。

朱氏的研究，雖限於清朝及民國以來的人物，然他在結論中以為自漢以迄今日，中國人物之變遷，似由西北而趨東南，成半月形。他以為這不但是中國人物變遷的大勢，而且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途徑。

我們以為從人物之地理的分佈，也許可以指出中國文化的發展，是由北而南，同時也許可以指出南北文化的優劣。但是他們對於南方文化是什麼，北方文化是什麼，却沒有明白的指示出來。從朱氏的表七，表八，表九，表十中，他告訴我們道：

「閱表七，知政治人物，仍以江蘇為最多，浙江次之，廣東又次之，河北又次之；其次序與表六大略相同，足見政治人物與人

物總數有極大關係。閱表八，知實業人物，以廣東爲最多，次爲江蘇，次爲浙江，又次爲河北；粵人僑居海外，長於經商，善於製造，實業人才之多，自非偶然。閱表九，知教育人物，亦以江蘇爲最多，浙江次之，河北又次之；江浙教育，素稱完善，故其教育人物較多。閱表十，知軍事人物，以河北爲最多，次爲安徽，又次爲山東。此蓋由民國十五年以前，中國軍事人物多爲北洋與皖之人。」

閱這段話的人，也許以爲中國北部的文化的重心是軍事，中部的文化的重心，是教育政治，而南部是實業。可是這個結論，是很不可靠的。比方從表七的民國政治人物之地理分佈來看，江蘇的人數是七十二，浙江六十三，廣東五十四，而河北四十四，以江浙兩省的人數，遠超過廣東和河北的總數。若說人物是文化的代表，那麼江浙要算政治文化的中心了。然而事實上，無論是從固有的政治或是革命的政治上看，江浙都非政治的中心。因爲從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五年，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在河北和廣東。又如根據表八的民國實業人物之地理的分佈來看，廣東佔有二十七名，而居首位，江蘇二十五次之，浙江二十一再次之，河北十一又次之，福建六名居第五位。我們若以廣東福建爲南部代表，江浙爲中部，河北爲北部，那麼實業人才，還是中部最多。這麼一來，所謂南方的文化的重心是實業文化，又不攻而自破了。再就表九的民國教育人物之地理的分佈來看，江蘇佔十九名居首位，浙江十三次之，河北九又次之，河南五又次之，而廣東比之四川還不及；若以河北河南爲北部代表，江浙爲中部，廣東爲南部，則江浙又是教育文化的重心了。然而事實上，河北教育，而特別是北京的教育之在民國的位置，並不亞於江浙。若謂廣東的教育因人物之無多，而像表中所示，其位置比之四川雲南福建江西山東河南等省不及

，是又不合於事實。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從人物之地理的分佈而推算某一地方的文化，總免不得陷於錯誤。要用這種研究來解釋南北文化的不同，更是不易得到公正的結論。

其實文化不只是包括政治，教育，實業，軍事；而政治，教育，實業，軍事，以及文化其他的方面，都有很密切的關係，這是研究文化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的。何況上面所舉出各家的研究所根據的材料，本身上已有了主觀的選擇，像湖南人李桓所編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對於湖南的人物特別注意，結果是湖南的人物，佔了第二的地位；這種缺點是朱君所承認的。李桓固不免陷於這種缺點，其他的名人錄，也免不得多少有了這種缺點。比方鮑威爾的中國名人錄的採集，也免不了主觀。一來因為鮑氏長住滬濱，故無意或有意中，對於江浙人物特別注意。二來因為所謂名人，既沒有一定的標準，而且個人認識能力有限，遺漏在所不免。此外自動的將自己的照片履歷送列名人錄者，又為一般人所不欲為，為之者未必就是名人。這些原因，以及他種原因，已使名人錄的本身上有了缺點。然則根據名人錄一類書籍，來做所謂科學的統計研究，未必合於事實，是很顯明的。

不但這樣，名人也許是文化的重要分子，然文化未必就是名人。因為某種文化的創造，不只是依賴於少數的名人。某種文化的形成，都靠在這種文化之下的大眾人們的努力。比方在某兩種文化之下，甲種的名人，可以時時和乙種的名人相等，或且較多；然甲種的文化，也許不若乙種進步之速。我們若把民國二十年來的所謂中國名人來看，恐怕多過許多國家的名人，然而二十年來的中國文化，比之外國文化並不一定見得較為進步。文化固是人類的創造品，沒有人類自然沒有文化，然而所謂名人，從一方面看去却可以說是文化的出產物，沒有文化，也許沒有名人。

此外如黃炎培先生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在人文雜誌所發表的清代各省人文統計之一斑，(二卷六期)以及其他關於這種研究的論文，當然不少，我們只能從略罷。

從歷史上研究中國南北文化的，有如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一卷二號楊筠如所譯日人桑原隲藏的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新亞細亞雜誌一卷三期張振之的中國文化之向南發展，及廣西南甯民國日報二十二年五月十日及十一日所登載張君勱氏五月七日在省行政會議演講會所演講的歷史上中華民族中堅分子之推移與西南之責任。

桑原氏的論文，約有萬言左右，但是註解備考多過本文五六倍，故材料方面，頗為豐富，對於研究這個題目的人給了不少的幫助。他以為舊有的南北區別，大致所謂北者，以黃河流域為主，所謂南者以揚子江為主。而他所取以為區別南北的界限，以淮水漢水為主。從此以北為北區，從此以南為南區。中國自古代至秦漢的人才，都是在北區，就是由「兩漢三國西晉時代文化的中樞，與先秦時代，略相髣髴，都在中國北區。永嘉之亂，北方被了異族的佔據，而且支配了古來漢族的根據地，和為文化中樞的中國北區。因此漢族的士民，尤其是中國的貴顯大官，名族甲姓——學問知識都是當時最卓越的漢族——的多數，不肯受塞外種族的支配，徙向中國南區永住，將漢族特有的文化向南方傳播，南北文化因種族之不同而各異。隋唐統一，南北文化融合，然南派却比北派優越。到了南宋以後，南方文化愈加發達，南盛於北，愈為明顯。在文運方面，固是如此，在戶口物力方面，也是如此，他的結論是：

「從上古到中古，中古到近代，隨着時代的進展，中國南區的一切文化，都凌駕北區起來。愛護種族的觀念很旺盛，智識文化也進步，經濟狀況也良好，戶口數目也衆多的中國南區，要佔



很重要的位置，自不用說。」]

事實上桑氏這篇文章不過將歷來大家所共同感覺到的中國文化的由北向南的歷史事實，重加申說，沒有什麼特見，而且這些解釋，只指明中國文化的歷史和地理上的趨向途徑，並非說明南北文化的性質的不同。

張振之的論文在材料內容見解上，都和桑原氏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暗合。所以看過桑氏的文章的人，可以不必看張先生的著作。

張君勳先生的言論，大致和桑氏所舉出的由北方的黃河趨向到南方的珠江流域，沒有差異；不過他對於抵抗外族的力量方面，特別注意。他的結論有了下面一段話：

「諸君假定問我為什麼今後救國之責任，西南為特重？又有人問我這向廣東雲南等人去說，亦何不可呢？我到廣西沒有幾天，觀察接觸的各方面不多，但覺得廣西地位及其性質上，約有五特點。一，廣西省在中原文化為後起，二，廣西人富於自信力，三，廣西人有勇氣，四，廣西人誠樸，故易一心一德，五，廣西人能刻苦耐勞，故合於革新時代所需要之清教徒的精神。此五大特點之中，其第一點換一名詞來說，可名曰少不更事，惟其少不更事，故能有朝氣，故願意有所作為。試一思之，五六十歲的人，閱歷已多，飽經世變，則其前進的興奮，決不能與二三十歲的青年相比；個人如此，地方的人民亦然。吾來此後，常聞此間廣西人以文化落後為恥，文化有好的方面與壞的方面，科學發達，理智發達，是好的，因此而有文獻的病，則是壞的。廣西人因文化落後，而保留許多好性質，是件不可忽略的事情。試想七國爭雄的時候，當時諸侯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與同中國之會盟。然卒滅六國者，非楚非齊，乃秦國

耳。羅馬所以滅希臘，日耳曼民族又滅羅馬，皆可以同類而並觀。惟其爲粗悍，乃有朝氣，乃有自信力，乃有勇氣，而所向無敵。文化落後的缺點固當矯正，然其優點不可不圖保存。

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國人有不少的感覺到中國民族的復興的責任，南方比較北方爲重。但是張先生以爲落後的文化，却有了不少的優點，而爲民族曙光，且可以凌駕他族，像秦之於六國，羅馬之於希臘，我們却未敢贊同。這一點馬君武先生在張先生講演之次日，在南甯軍校講民族文化與民族的復興（五月十二日南甯民國日報）已經指摘出來。馬先生的理由，是現代與古代的歐洲，（蒙古時代）都完全不同。現代世界經過二大變化，一是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二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經了這二次變化以後，歐洲的物質文明日進無已，至於不可思議，所以救國的責任，不只是靠著單簡的不怕死所可能，還要有充分的科學的智識和機器的了解。馬先生這種見解，是我們所贊同的。我們固然相信南方在中國的文化的的重要，然而極力提倡精神文化，懷疑物質文化的張先生，若只是提倡所謂固有的精神，而懷疑物質的文化，則不但中國的北方沒有希望，連南方也恐會變成開倒車的危險呵！

此外又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國學演講錄裡（頁九五——九六）所提出的南北朝時代的南北文化觀，以及其他的段片的歷史的或是歷代上的南北文化的言論，雖也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研究南北文化，然爲篇幅起見，我們只好從略。

以文化的政治方面來做研究南北文化問題的，像民國十九年冬爲寧粵和平奔走而在嶺南大學講演的張溥泉先生，及在獨立評論第三十七期所發表今日中國的兩綫希望的尹及先生。

張溥泉先生也以爲由歷史上看去，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是由北

而南，而其發展的速度，從秦始皇築成萬里長城以後，較為厲害。始皇想杜絕匈奴的南下牧馬，而使其帝業垂諸萬世而不朽，因築萬里長城；長城之完成，在政治上固可以阻止外族之南趨，以擾亂中國，文化上却阻止中國文化之北向發展。且當時中國文化之中樞，乃在北方，再向北發展既為長城所阻止，唯一的發展方向，便是南方。

歷史上的中國文化的發展的方向，固是由北方到南方，但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却是由南而北。張先生在這裡所指明的，特別是現代政治上的由南而北的運動。張氏本來是在政治舞場上活動的人，這次講演也是以政治方面為立腳點。在他講演的時候，瀋陽方被日本佔據不久，他看看日本數十年來在滿洲的經營，正是東北的危機。同時他又看到北方的蒙古和西北的新疆，百里沒有人煙，而國人，特別是遠在南方的南方人，對於這些地方的情形，太過隔膜，所以免不得要喚醒一般青年不要等閒去看待這些疆土。

不但這樣，張先生又眼看着南洋一帶的行情，日趨險惡，華僑之寄託於這些地方者，好幾百萬，這麼多的人們，要是在南洋沒有可以棲身之所，必定跑回中國國內，不但是因為他們回來而斷絕了從南洋每年輸入的錢財，還且增了無數的無業遊民。補救之方，是要向北走，所以向北走的口號，不但是現代歷史所已證明的事實，而且是我們所應行的途徑，所應採的方針。

張先生固然告訴我們中國的文化的由北而趨於南，以及由南而趨於北的兩種趨勢。然他却沒有告訴我們這兩方文化的異同之點如何。所以這種的南北文化觀，還是很不清楚，沒有澈底。

尹及先生的意見，可於下面數段見之：

「今日之中國與明末的中國有希望的分別，已如上述；有希望的共同點是甚麼呢？我以為是這樣。華南是反攻的大本營，是

救中國復中國的策源地。

「清朝征服華北，比較速點，征服華南，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費了五十年功夫，才告成功。反抗清朝的勢力，都不是在華北華中的一望無際的平原，而是在高山峻嶺的華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鄭成功還佔據臺灣，到康熙晚年，（一六八二）經過康熙雄謀大略的用兵，才告克定。假如中國今日是給外敵征服，華北必在先，華中次之，華南必最後。將來反攻的勢力，如洪秀全，孫中山輩，也許來自兩廣。

「我們試想華北離東三省最近，受外敵的刺激應該最深，抵制仇貨的運動，也應該最烈；而實際上不然，抵貨運動，反在離東三省最遠的廣東為最熱。近年以來，公共建設事業，還算兩廣首屈一指。論起民氣，無論誰都不能否認南方比北方強烈些。頭一個敢與日本開仗的，還是十九路軍的南方人。這並不是說北方不成，北方民氣之所以不振，也許有原諒的理由，但南方民氣的雄比北方強烈些，事實具在，無容諱言。

「原來南方與北方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北方災荒多，而南方災荒少，災荒對於中國人人格的影響，美國有一位學者 Ellesworth Huntington 已詳乎言之。災荒於中國人自私性格的養成，實在值得注意。中國為一根深蒂固的災荒國家，所以處處都露着互相傾軋排擠的現象，彷彿人人都不能一飽。至於所謂同情心，憐憫心，更談不到了。災荒多重的地方，此種性格愈為顯著，災荒少的地方，則比較好些。

「華南受條約的束縛，比華北地方較少些，華北受「辛丑條約」「二十一條」等等的束縛，不知吃虧多少。即如這次山海關的陷落，據何國柱說，因為辛丑條約都把險要給了敵人，所以華

軍無險可守，節節敗退。華南亦未嘗無條約的束縛，如香港澳門雖橫梗於珠江出口，但都不是致命傷，歷史上亦未曾有過以香港澳門爲對華用兵根據地的事實，以視東三省現已變作日本對華北用兵的根據地，及平津各處都有外國駐兵那塊地方，比較的容易作反攻根據地，就可不言而喻了。

「華南比華北富庶，少受經濟上壓迫，運籌策畫都比較容易下手，這也是事實。國民黨的革命幾乎完全倚靠廣東的財源，以一省之力的廣東，給養革命黨的迭次用兵者凡三十餘年。除江浙而外，中國沒有一省有如此能力的。這其中廣東的華僑，在財力上的接濟，當然不算少。」

尹及先生以爲中國的政治的將來還是希望和靠南方，而南方的優點，是地理上有天然的險要，民氣上比北方強烈些，條約上的束縛比華北地方較少些，經濟上比華北較爲充裕，以及災荒上較北方爲少。這些優點，以及其相反的缺點，是南北的重要差異。這些差異從地理，政治，或經濟的觀點看去，雖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然從整個文化的觀點看去，却沒有法子得到一種明白的概念。因爲所謂地理上，所謂高山峻嶺，是天然的優勢，而超出文化的範圍以外的。所謂條約的束縛較多或較少，也不外是一種條件或限制，我們不能叫北方的文化做束縛較多的文化，或是南方的文化做束縛較小的文化。這些名詞不但不能成立，而且不通。又如經濟充裕，災荒比較稀少，也不能把來說明南北的差異，因爲這些經濟上的量的比較，對於文化的認識上，沒有什麼意義。比方我們說貧窮的文化，或是富裕的文化，簡直就是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在政治經濟或地理上，我們可以表同情於尹及先生的南北異同，然在文化的觀點上看去，這些差異，就不能給我們以一個明白的

解釋。

尹及先生對於中國南北兩方的經濟的不同，已經見到；但是對於這點加以特別注意的，要算梁園東先生在新生命雜誌三卷十二期裡所發表的現在中國的北方與南方。

梁先生也承認：在歷史地理上看去，中國文化的發展，是由北方而趨至南方，但是其所以由北方而趨於南方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經濟重心是在南方。經濟重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是地理氣候却有了不少的作用。北方因為地理氣候種種原因，故其經濟生活，不但沒有南方這麼容易，而且還要依賴南方以維持其經濟生活。因為北方要賴南方的經濟生活，北方不得不設法和努力去統治南方。梁先生說：

「北方所以統治南方，是因為北方經濟供給不及南方，為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北方必要取南方，南方却不必統治北方，已可維持。」

這是已往的中國的南方和北方的關係，現在却有了很大的變化了，而這個變化，並非內部的自身變化，而是外方勢力的影響所致。梁先生說：

「自歐洲勢力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的南部數省起了極大的變化，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文化上，無不有極大的改變。現代中國的南方和歷史的南方，所有的差異，較之現在北方和從前北方所有的差異，大不止倍徙。現在的北方，尋不出多少社會原素，和歷史的北方不同；但是南方却不然，因是南北的關係也就變了。」

質言之，現在的北方固和過去的北方相同，現在的南方已和過去的南方大異。其所以大異的原因，是因為歐洲勢力侵入中國的影響。這種的改變，又影響到過去的南北的關係。換言之，就是歷史上的北

方統治南方，已經停止，但是現在的南方固不受北方的統治，北方——據梁先生的意見——若聯合數省起來保着固有的精神和能力，却仍可以和南方相對抗，而不受南方的控制。

可是這種對抗是梁先生所不贊成的，而且中國南方和北方這種畛域，是不應當有的。因為中國的民族有了像儒家的思想來做他們的共同意識，而這種共同意識，又是他們同舟共濟，不分南北的一種原動力，他說：

「由北而南，或重北輕南的封建遺論，不應有；即連由南方或由北方統一的思想，也不應有，根本上南北的畛域觀念，即不應有。」

梁先生好像感覺到南北文化的異點，比較一般的人的見解和研究，頗為深刻。可是他也沒有明白的說出，南方文化是什麼，北方文化是什麼。因為對於這一點沒有充分的認識和顯明的解釋，他遂以為在南方文化起了變化以後，北方雖已失了控制南方的能力，然北方若能團結起來，還能對抗南方。同時他又相信：像儒家一類的傳統信條，還可以利用以做中國人的共同意識，而調濟南北對峙的缺點。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而其錯誤的原因，我們當在下面說及。

此外又如民國二十一年夏，莊澤宣先生在朝暉半月刊第一期發表一篇西南的貢獻與西南的使命。莊先生指出百年以來對於帝國主義的抵抗最有力而且最成功的，要推西南各省。他以為在鴉片戰爭時代的林則徐，在中法戰爭中的劉永福和馮子材，以及最近來的十九路軍之在滬抗日，均是西南勇於對外的表示。此外又如南方的華僑之在南洋及各國的經濟勢力，以及中國近數十年來的大企業家大銀行的組織者，都是南人。這是西南人士的對外的力量的表徵。至於對內方面，他指出清末的同盟會，民國十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首先倒袁的雲南護

法的西南政府，北伐中的兩廣武裝同志，以至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和梁啟超的學術工作等，都是西南方面的貢獻。因為西南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貢獻大，所以她的責任也比較大。所以莊先生又指出西南人士所應當下大決心來做的幾件事。如設法幫助華僑，獎勵華僑回國投資整理鄉村，防止都市的畸形發達等。

莊先生看出南北兩方有了很多的異點，如他說西南奮發有為，東北頹喪無能；南方富庶，北方窮困等。但是他也沒有明白的給我們以一個概念，南方文化是什麼，北方文化是什麼。而且經濟上的南北不同，老早已有人說過，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是歷史上的已然的事實，和最近東北事件發生以後的一種反響。

末了如朱謙之先生和其他數位在中山大學史學研究會所出版的現代史學一卷二期所發表和轉載幾篇文章，南甯民國日報副刊（廿二年五月十八日）以及廣州民國日報的現代青年欄所發表過幾篇文章，以及像 Ellesworth Huntington 的外國學者的中國的南北對比觀（參看氏著 The Character of Races, Chap.2）以至廣州黨部前二年的南方文化運動的提案，均是對於南北文化觀這個問題上發揮意見，我們因為篇幅的關係，只能從略。